

明铜活字本《曹子建集》 与《杜审言集》赵元方题跋

王 玉 良

已故当代著名藏书家和版本鉴定专家赵元方先生，名钊，号无悔，其藏书室亦名“无悔斋”。赵先生虽毕生从事金融事业，但从很早就喜好藏书和古籍版本研究。1952年赵元方先生将一批珍藏的善本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，其中明铜活字本《曹子建集》，有赵先生乙酉年（1945）朱笔跋文云：

此活字本，不著刻书年月、姓名，诸家著录或以为明初。按李廷相本（笔者按：即舒贞所刻《陈思王集》十卷，为李廷相编次）有正德五年田澜序，称书估舒贞“往岁过长洲，得徐氏《子建集》百部，行且卖之无余。盖彼活字板，初有数，而今不可得也”云云，当即指此本而言。是则刻于宏（弘）、正之间、非明初也。此本源出于宋，而与嘉定本时有异同，所缺字，彼皆不缺，此或别有所据。至郭云鹏本，行款悉与此同、而缺字皆以意补，不与宋同，不知何据？所谓不如不刻者也。季弟得一本，为王惕甫旧藏。取以相校，则卷六《怨歌行》：“泣涕常留连”，“泣”王本作“法”。卷八《献璧表》：“万国之弊”，王本“弊”作“幣”。卷九《与杨德祖书》：“嵒五霸于稷下”，“嵒”王作“訾”。知活字本排印亦不只一次，当再假他本校之。

乙酉十二月十八日无悔。

按此明铜活字印本《曹子建集》十卷，九行十七字，细黑

口，左右双边。历来为藏书家所重，藏园云“所谓无《七步诗》者也。”北京图书馆曾先后收藏三部：一为赵氏此本，一为吴元恭旧藏本，其卷六、卷八、卷九三处，即作“𣎵”、“幣”、“𣎵”字；又一为王士禛旧藏本，其三字则为“𣎵”、“幣”、“𣎵”，又与两本不同。足证赵先生“知活字本排印亦不只一次”之说甚是。说明活字本在印刷过程中往往亦有校改文字的情况，应引起校勘和编目者的注意。王士禛旧藏本又有其亲笔题跋，误定该本为宋刻。

1984年赵元方先生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图书二十一种，其中明铜活字本《杜审言集》前后有赵元方朱笔题跋三通。前跋云：

予自收书以来，颇留意于明铜活字本，顾其排比多局，流布遂罕。二十年来，重价酬书，所得不过十九种。其中如安国活字《吴中水利通志》、《古今合璧事类》不见藏家著录。华理活字《渭南文集》，金兰馆活字《西庵集》，五云溪馆活字《玉台新咏》，今日藏弃亦鲜，皆邻于孤本者也。1952年以其十七种献之文化部北京图书馆。余二种：一为万历活字包大炯《越吟》，一即此本。此为活字唐集之一，以太宗为首，凡五十家，而不著刻印时代、姓氏。昔人或以充宋刻，或诤为北宋胶泥活字，或以为明初活字，以别于华、安诸家，盖无定论。直至近年，搜罗日富，审鉴日精，乃与《曹子建集》并定为明中叶活字，然亦无他引证也。予亦有《曹集》，颇疑其同出一源，顾不得显证，终不敢意必。昔岁得正德五年舒贞刻《曹集》，田澜序云：“舒曰：‘往岁过长洲，得徐氏《子建集》百部，行且卖之无余矣。近亦多问此集，贞久无以应之。盖彼活字板，初有数，而今不可得也’云云。此可证《曹集》之刻时、刻地、刻氏，而犹不得其名，且与唐集无涉也。1963年妻亡，复卧病，无以遣怀，乃取《四友斋丛说》阅之。于卷二十四〈诗〉中，有李端《古别离》条云：“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《李端集》”云云，

乃恍然大悟，《曹集》、唐集同出于徐氏，而刻于弘正之间也。两证犁然，有当于心，颜黄门所谓我辈定则定矣，积年未解之结，一旦得解，何快如之！书固离人，人终未离书也。当与同好共乐之！ 1966(年) 3月22日 病中书此，又过三年矣。元方年六十二。

后跋云：

凡铸铜活字，用铜必多，非富家不办。明初铸钱尚不给，何有于活字。其时商贾富家，旧者已破，新者未兴，亦无若大资力也。至弘、正之间，商力渐充，海上交易亦盛，而产铜日旺，故嘉靖初曾补铸九朝之钱，足征铜富。活字之兴，恰在其时，固有由也。厥后征榷日繁，铜产更减，万历矿税苛政，安、华二家其能免乎？故木活字代之而起也。即一活字之兴衰，亦可见上下之争矣。清代乾隆毁铜活字，亦此故也。无悔题。

又卷末朱笔题：“明弘治间长洲徐崦西铜活字印本”一行。按此《杜审言集》等一批活字本唐人集，其行款边栏一律为九行十七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边。均无注文小字，版式疏朗，字体古朴典雅，墨色浓而有漆光，刷印亦较均匀。受到清代不少藏书家的重视，而著录亦多有失误。至清末民国以来，一些学者如傅增湘等始定其为明活字印本。

赵元方先生几十年来致力于收藏和研究活字本，他的《杜审言集·后跋》，从研究金融史中明代铸钱的情况出发，说明明代弘治到嘉靖期间江浙沿海等省，尤其是无锡、苏州商贾富家兴起以铜活字印书，与当时铜产量增加有直接关系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这就为解决无锡华氏等各家所谓“活字铜版”是否就是铜活字版，还是铜板锡字以及明代铜活字兴衰原因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